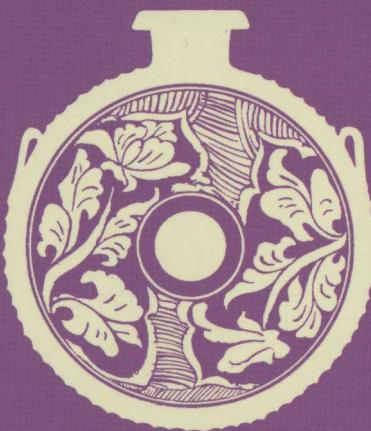




西北民族论丛 第五辑

周伟洲 主编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周伟洲 主编

西北民族论丛 第五辑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西北民族论丛·第五辑/周伟洲主编·—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6

ISBN 978-7-5004-6229-3

I. 西… II. 周… III. 民族历史—西北地区—文集
IV. K280.4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80717 号

责任编辑 张小颐

责任校对 林福国

封面设计 王 华

技术编辑 张汉林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84029450(邮购) 010—64031534(总编室)

网 址 <http://www.csspw.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新魏印刷厂 装 订 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07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7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50 × 1168 毫米 1/32

印 张 7.25 插 页 2

字 数 220 千字

定 价 25.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西北民族论丛》编辑委员会

主 编 周伟洲
成 员 (以姓氏笔画为序)
于志勇 王 欣 尹伟先 厉 声
吕建福 余太山 杨圣敏 张 云
李大龙 李范文 李 琪 罗 丰
苗普生 周伟洲 高永久 樊明方

主办单位 陕西师范大学西北民族研究中心

前　　言

《西北民族论丛》为陕西师范大学西北民族研究中心主办，每年出版一辑。《论丛》是以“西北民族”为研究对象，重点是西北民族史与民族关系史、西北民族与邻国交流史、西北民族宗教文化研究、西北民族地区自然环境与社会发展研究等。从学科来讲，西北民族研究不仅涉及历史学中的民族史、中外关系史、历史地理、历史文献学、科技史、文物考古等学科，而且也涉及民族学、社会学、地理学、法学、经济学等人文社会大学科。因此，西北民族研究，虽然仅是对西北地域的各个民族历史与现状的研究，但其包含的内容却非常丰富；且其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在西部大开发的新形势下，尤为重大。

《论丛》面向国内外（包括港台），广集有关西北民族研究的论文及民族调查报告、译文、书评等，以期广纳百川，尽量展示有关西北民族的高水平研究成果。

《论丛》还将收录陕西师范大学西北民族研究中心举办的面向国内外的“马长寿民族学讲座”论文，采用匿名审稿制度，以学术创新和水平作为择稿的主要标准，不囿于一家之言，提倡平等争鸣，以达到不断提高学术水平，推动西北民族研究的创新和发展的目的。

总之，《论丛》的宗旨是：繁荣学术，服务现实；形式多样，不断创新。我们期待国内外广大学者、读者关心和支持《论丛》，并不

2 西北民族论丛

断惠赠佳作,共同将《论丛》办好,使之能在我国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中,在西部大开发的现实中,作出自己的贡献。

最后,感谢陕西师范大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及所有支持《论丛》出版的单位和个人,没有他们无私的支持和帮助,《论丛》是难以如期出版的。

周伟洲

2002年2月

目 录

前言	(1)
发展观的转变与人口发展战略	田雪原(1)
族群历史之文本与情境 ——兼论历史心性、文类与模式化情节	王明珂(25)
乌丸莫那娄氏考 ——附考乌丸渴烛浑氏、乌丸叱罗氏	滕昭宗(60)
铁弗匈奴的形成及早期历史	吴洪琳(71)
公元三至九世纪新疆地区的民族及其变迁	周伟洲 李泰仁(96)
西北少数民族教育发展的政策与途径选择	王 欣(111)
西北少数民族宗教文化的基本特点及其地位和作用	吕建福(143)
韩国佛教的思想特征 ——以新罗末期、高丽初期为中心	郑炳朝(160)
中国对“海东求法僧”的待遇和认识 ——以佛教史籍的叙述为中心	金相铉(182)
法藏的思想变迁及元晓的影响	石吉岩(193)

2 西北民族论丛·第五辑

附 录

- 第七届“马长寿民族学讲座”纪要 (219)
九至十三世纪中韩学术交流研讨会纪要 (222)
编后记 (226)

发展观的转变与人口发展战略

田雪原

所谓发展观，就是对发展的认识或看法，即审视发展时所站的立场或所持的态度。这样的立场、认识、看法和态度，是“制导”发展的神经中枢，“导航”着经济、社会发展进程始终。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更长远一些时间人口发展战略的制定，也必须置于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之下。

一 发展要转变观念

转变之一：发展的目的和目标。社会发展的历史表明，任何时代的发展，都有着一定的目的性。在以人、畜为主要动力和以手工工具为基本特征的农业社会，从国家和社会角度观察，国泰民安、丰衣足食成为社会发展追求的目标；从个人和家庭角度说，“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便是自然经济条件下一般农民发展目标的真实写照了。18世纪中叶产业革命发生后，新兴的资本家阶级追求的是资本的自我增值，是利润的最大化，国家则逐渐把注视的焦点放在了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增长上。这一点不仅为发达国家的实践所证明，而且受到西方发展经济学的推崇，成为20世纪社会经济发展的主导理论。由于近代以来我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如果说存在以某种目的为主导的发展观的话，农业社会的发展观显然占据着主要的地

位。农业社会发展观向工业社会发展观的转变，是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事情。

新中国成立后，首先进行了三年国民经济恢复和大规模的“一五”建设。这一时期提出了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一化三改”的总路线，工作重心开始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然而 1957 年的政治斗争升级，1958 年“大跃进”又打乱了正常的经济建设秩序，强化了追求产量增长的目的性和评价指标的首要性。“大跃进”对钢铁、粮食等工农主要产品产量规定了具体的“跃进”指标，尤其是钢铁一定要翻番，要由 1957 年的 535 万吨“跃进”到 1958 年的 1070 万吨。能否使钢铁、粮食等产品产量大幅度增长，成为衡量“大跃进”成功与失败的根本标志。其后直到改革开放前，产量的增长一直是社会经济发展追求的主要目标，衡量发展的主要标志甚至是唯一的标志。因此，新中国成立后 30 年的发展观，可称之为追求产量发展观。进入 80 年代，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提出“三步走”发展战略目标，到 2000 年工农业总产值（后演变为国民生产总值、国内生产总值）比 1980 年翻两番，21 世纪中叶达到一般发达国家水平。这样，发展的目的和目标，就由过去以产量为主转变到以产值为主上来。事实上，我们在组织完成上述“三步走”第二个发展战略目标和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时，自觉不自觉地将发展等同于经济增长，进而又将经济增长等同于 GDP 的增长；将“发展是硬道理”，等同于经济增长是硬道理、GDP 的增长是硬道理，陷入以 GDP 的增长判断发展程度的传统工业社会发展观。改革开放 20 多年来中国创造了发展的“奇迹”，世人公认的“奇迹”；不过需要清醒地看到，这还是在传统工业发展观“导航”下的“奇迹”，而 GDP 的快速增长也掩盖了社会发展某些方面的缺陷。对于这些缺陷的认识和改变，需要时间和过程。所幸的是，

20世纪90年代以来对这些缺陷的认识和改变不断取得新的进展。先是中央于1991—1996年在每年人大、政协“两会”期间召开计划生育座谈会，接着于1997—1998年召开计划生育和环境保护座谈会，1999年以来召开人口、资源、环境座谈会；1994年，中国政府发布《中国21世纪议程——中国21世纪人口、环境与发展白皮书》，用实际行动履行1992年联合国环发大会承诺，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制定本国21世纪议程的国家。这表明，我们已对传统的以GDP增长为主的发展观的某些缺陷有了一定的认识，将可持续发展提到议事日程上来，揭开发展观转变的序幕。

进入21世纪以后，这种发展观的转变由序幕走向高潮。党的十六大将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发展目标，确定为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六个更加”，并从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和可持续发展四个方面，阐述了“后小康”发展的具体目标和要求；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统筹城乡发展、区域发展、经济社会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五个统筹”。这“六个更加”、“四个方面”、“五个统筹”，大大突破了前小康社会以GDP增长为主要目标的传统发展观，将其提升到以人为本的高度。以人为本的发展观，最基本的一条就是发展的目的是为了满足人的全面发展的需要。发展为了满足人的需要，本属天经地义，然而以GDP增长为主要目的的传统工业社会发展观，却难以做到。一是立脚点、出发点不同；二是以GDP增长为主要目标的发展，即使能够满足人的发展的某些方面的需要，也难以满足其他方面的需要，甚至以损害其他方面的需要为代价。满足人的全面发展的需要，包括满足人的生理、心理、文化、交往等全面发展的需要，只有转变发展观念，将发展观建立在以人为本的基础上，才有可

能做到。党的十六大提出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六个更加”、“四个方面”和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三生”文明发展道路；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旨在加强薄弱环节、实现社会全面发展的“五个统筹”，明白无误地阐发了发展的目的性和以这一目的性为主线的新的发展观。因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评价指标体系，也要突破以GDP为主的框架局限，充分反映发展的目的性。最近，由笔者同王国强主持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人口与发展研究”课题，请有关专家参与提出GDP增长速度、人口净增长率、人均GDP、城市化率、第三产业从业人员比例、公共教育经费占GDP的比例、在校大学生占适龄人口比例、每千人口医生数、平均预期寿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民人均纯收入、居住条件、人均生活用电量、恩格尔系数、城乡收入差距、贫富差距等多项指标，无疑GDP在这些指标中具有基础的性质和作用。但是有一半以上的指标不属于GDP范畴，而属于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范畴，反映出发展目标的全面性。更为详细的，并且增加到30多项的指标，主要侧重在反映城乡居民物质生活特别是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方面的指标，充分体现了满足人的全面发展需要的宗旨。而且在各项指标权重的设定上也得到体现，尽量把GDP和非GDP指标的权重定得比较合理，反映科学发展观的内涵。也有建议提出，应增加男女平等等方面的内容，这对于纠正当前出生性别比失衡有特殊意义。这一建议是有积极意义的，只是由于一时拿不出比较科学的量化指标，而未能辑入。

转变之二：发展的动力和手段。以GDP增长为主要目的和目标的传统发展观，外延式扩大再生产是增长的主要手段，固定资产投资的增加是其主要的驱动力。我国1986—1990年GDP年平均增长7.9%，固定资产投资年平均增长12.2%；1991—1995年，二者年平均增长速度分别为12.0%和34.7%；1996—2001

年，分别为 8.1% 和 10.9%^①。从总体上看，GDP 的增长具有高速和比较平稳的特点；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起伏要大一些，但一直保持在 10% 以上，明显高出 GDP 一截。由此可以认定：20 多年来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主要还是依靠扩大固定资产投资拉动的。正是由于这样的原因，才形成经济发展内部结构不够合理和效益不高，社会发展不全面等方面的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就要在发展的动力和手段上进行革命性变革，由以投资产出资本增长为主要驱动力和外延式扩大再生产为主要方式，转变到以人力资本为主要驱动力和以内涵式扩大再生产为主要方式上来。

社会总资本由自然资本、产出（生产）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构成，不过不同历史发展阶段对“四大资本”依赖的程度有很大不同。农业及农业以前社会主要依赖自然资本，传统工业社会主要依赖产出资本，现代（后工业化）社会主要依赖人力资本以及同人力资本相关联的社会资本。所谓人力资本，是指人的知识、技能、经验和健康具有的价值总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以微电子技术为先导，包括新能源、新材料、宇航技术、海洋技术、生物工程等的新技术革命兴起，当前已经发展到以生命科学为主导学科，包括基因工程、克隆技术、纳米技术等为代表的新的阶段。信息化、经济全球化成为不可阻挡之势，知识型经济的迅猛发展，使竞争主要表现为人才的竞争，人力资本的竞争。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作为我国现代化建设的一个重要阶段，无疑要将大力提高人口素质放在首位，努力把人口数量优势转化为人力资本优势；再不失时机地将人力资本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发展提供新的发展动力。在过去的半个多世纪里我国人口素质有了长足进步，目前婴儿死亡率降低到国际公认的较低水平，出生时的预期寿命达到

^①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2）》，中国统计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23 页。

71岁的较高水平，人口文化教育素质大幅度提高，从而为发展动力转化奠定了初步的基础。虽然目前我国人口身体素质、文化教育素质总体水平还不够高，同世界较高水平国家相比还存在较大差距。然而，一是有了初步的基础，二是确立了大力提升人口素质和科教兴国发展战略，人力资本的大幅度提升也就有了希望。现在的问题是，要创造出对人力资本不断追加的市场需求，为人力资本的积聚提供充分的条件。这就要求经济和社会发展总资本中，不断提高人力资本的含量。结合当前实际，特别值得提出的是，经济发展要突出优化结构和提高效益。“优化结构”和“提高效益”，是党的十六大作为2020年GDP比2000年翻两番的前提条件提出来的，有着很强的针对性。

“优化结构”，主要指优化国民经济三次产业之间和三次产业内部的结构。2002年我国第一、第二、第三次产业产值之比为15.4:51.1:33.5，按照经济发展水平与产业结构变动的一般规律，第一、第二次产业所占比例偏高，第三次产业比例偏低。按就业人口计算，三次产业就业结构之比为50.0:21.4:28.6，较按产值计算的三次产业结构又落后一大截，第一次产业就业比例严重偏高，第三次产业就业比例偏低许多；城乡结构情况更为严重，2002年城乡人口之比为39.09:60.91^①。由此形成人口城乡结构落后于三次产业就业结构，三次产业就业结构又落后于按产值计算的三次结构很不协调的状况。怎样解决呢？最有效的办法是提高人口素质，提高三次产业特别是农业的技术构成和劳动生产率，推动农业劳动力向城镇工商业的转移和人口城市化的加速进行。此外，还要注意到三次产业结构内部的调整。目前直接从事农业种植业的人口和劳动力过剩，农业内部结构调整主要是

^①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3）》，中国统计出版社2003年版，第34、97页。

将种植业中这部分过剩的人口和劳动力，调整到林、牧、渔业，进行劳动力从狭义农业向广义农业的分流或转移。这种调整的目的，在于缓解农业种植业劳动力过剩与耕地不足的矛盾，为从根本上解决农民、农业、农村“三农”问题创造条件。占GDP最大比重的第二次产业内部比例关系的调整，也值得重视。过去在计划经济体制和优先发展重工业方针指导下，形成“重重（工业）轻轻（工业）”不合理的工业结构。虽然改革开放以来有了很大改观，东北等重工业基地技术陈旧、设备老化、污染严重一类问题积重难返，亟待解决，振兴东北等老工业基地战略，也包括工业内部结构的调整。就总体而言，如何从传统工业化向现代化转变，如何用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三次产业内部结构的调整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提高效益”，就是要用最小的投入获取最大的产出。以GDP增长为主要目标，以固定资产投资增长为主要手段，以外延扩大再生产为主要方式的传统发展观，有两大显著特征：一是经济效益不高，表现为高投入、高消耗、低产出、低效率；二是忽视甚至以损害社会效益为代价，换取经济方面的效益。“后小康”建设发展观的转变，一定要树立低耗、高效和融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环境效益于一体的新的发展观。要提高作为第一次产业农业的效益，只有改变目前一多半人口搞饭吃，加快农业人口和劳动力向城镇转移，让留在农村的人口和劳动力占有更多的自然资源，实现农村人力资本和自然资本、产出资本、社会资本的合理有效配置，才能大幅度地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和增加农民的收入。作为第二次产业的工业，只有优化结构，用信息化带动工业化，才能逐步走上科技含量高、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得到充分发挥的集约化发展道路。归根结底，国民经济效益的提高主要取决于人力资本的积聚和增长，取决于全民族的健康、科学、文化、思想和道德素质的提高。而这诸多方面人口素

质的提高，除了要以经济的发展作为基础外，还取决于社会的全面发展，树立新的社会全面发展观。2003年春天我国一些地方SARS流行，暴露了我们在流行病预防、公共卫生投入不足以及不良卫生习惯等方面的许多弱点；单就经济效益而言，造成的损失远大于公共卫生投资欠账节省下来的费用，教训是十分深刻的。投资于科学、文化、教育、卫生、体育、社区建设等公共事业不是消极的，表面上挤占了一部分财政支出，影响到经济建设投资；实际上这些财政支出满足了人民群众全面发展的某些方面的需要，不断提升着人口的素质，最终起到推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发展的作用。“提高效益”不应局限在经济领域，大力加强教育和科学事业，发展先进文化，加强精神文明建设等全面的社会发展，同样是发展的驱动力，具有提高效益的功效。我们不但要在物质文明建设中寻找提高效益的动力和手段，而且要在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中寻找动力和手段，向“三个文明”建设要速度、要效益。

转变之三：人与自然的和谐。党的十六大将“可持续发展能力的不断增强”，列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四项奋斗目标之一，具体化为“生态环境得到改善，资源利用效率显著提高，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推动整个社会走上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要实现这样的“三生”和谐和“五个统筹”的全面发展，除了要树立协调的经济发展观，包括经济自身发展的集约性和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协调性；全面的社会发展观，克服现实社会发展中的某些滞后方面之外，从根本上说，就是要谋求人口、资源、环境之间的协调，树立人与自然和谐的发展观。我们强调经济的协调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最终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解决人口、资源、环境问题，促进三者之间的和谐和人与自然的和谐。

人口、资源、环境在可持续发展中的位置，笔者概括为：资

源是可持续发展的起点和条件。从资源角度审视发展，包括可持续发展在内的一切发展，都可归结为资源的物质变换：自然资源的物质变换，社会资源的物质变换，更多的是自然资源与社会资源相结合的物质变换。因而没有资源的物质变换便谈不上发展，资源是可持续发展的起点和条件。

人口是总体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没有人类参与的自然资源进行的物质变换，是自然进化；只有人类参与并且按照人的目的进行的物质变换，才称得上我们所说的发展。发展是可持续还是不可持续，同人口变动，包括人口数量、质量、结构紧紧联系在一起。通过人口的生产活动和社会活动，即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改变着资源和环境，形成特定历史时期的发展观和发展模式。

环境是可持续发展的终点和目标。随着人口的迅速膨胀和人们进行物质变换手段的增强，尤其是工业化突飞猛进发展造成的环境破坏，使人们不得不反省自己的传统发展方式：如此发展下去后果怎样，发展的目的和目标是什么？于是自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率先在一系列国际环境会议上，提出和讨论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环境问题成为早期可持续发展讨论的“热点”。环境是不同发展方式结果的警示器，可持续发展归根结底是为了创造有利于人的生存和全面发展的环境。

基于这样的分析，人口、资源、环境与可持续发展，最终归结为人与自然的和谐，归结为人口的变动和发展与资源、环境相适应，即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三生”文明发展目标。立足于人口与发展，重点是：

人口的变动与发展同资源的开发与利用相适应。人口数量增长要增加资源消耗是一目了然的。然而，人口数量变动对资源消耗的作用还有另一方面，即人口增长对于资源消耗说来，具有“加权”的性质。人们追求高生活质量的欲望无限，为了满足这